

西江中游文化区的生业经济及其发展阶段

陈洪波

(南京大学历史系, 江苏 南京市 210093)

关键词: 西江中游文化区; 新石器时代; 生业经济; 贝丘遗址

摘要: 西江中游地区是岭南历史文化区内一个相对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 新石器时代大致经历了三种生业经济形态, 早期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 中期是一种利用贝类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 晚期是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演进过程在整个文化区内具有一致性。贝类利用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呈现出一种显著强化的趋势, 但一直未在食物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Key words: the Middle Xijiang River Cultural Region; the Neolithic Age; subsistence strategy; shell midden site

Abstract: The Middle Xijiang area is a relatively cultural region in Lingnan, which had lived through three subsistence strategies throughout. It was a broad-spectrum hunting and gather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time. In the middle time, it had turn into a hunting and gathering economy which had mainly exploited shellfish. And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cultivated rice agriculture had come into in the late time. The evolution process is primarily consistent in the whole Middle Xijiang River Cultural Region.

西江中游地区的发现构成了岭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主体之一, 由于涉及到农业起源、家畜驯化、陶器产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颇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本文从现有资料出发, 将西江中游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区域文化单位, 即西江中游文化区, 对其经济类型的发展阶段性与转变做一尝试性的分析与探索。

一、关于西江中游文化区

岭南地区也被称为华南地区, 自然区划上主要指南岭以南由珠江水系覆盖的丘陵地区和河谷地带^[1]。在 20 世纪后期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学说中, 以两广为中心的岭南地区并未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达, 而是将华南一带表述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以印纹陶作为这个区域的基本文化特征^[2]。近年来, 随着考古资料的迅速积累, 学术界又产生了一些新的思索。如卜工认为, 这一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区

又可以细分为东、西两块, 西部是珠江中游地区(亦即西江中游地区), 东部是珠江下游地区, 说明岭南地区考古研究也存在区系类型问题^[3]。也有学者认为, 华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从来就可以分为福建、广东(含沿海岛屿)与广西(含越南北部)两个大的区域, 从很早开始这种区别就一直比较明显^[4]。

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区的形成, 都有特定的地理基础作为最底层的原因。从地形而言, 西江上游, 即广西的西北部, 基本上是高山地带, 属于云贵高原的东缘, 西江的下游则进入粤西山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西江中游地区地形复杂, 盆地、平原、丘陵、山地相间, 平地牵连成片, 地势相对较低, 所谓的“广西盆地”主要指这一片区域^[5]。岭南文化区两大块中的西部这一块, 主要就是指西江中游地区^[6]。目前在西江中游的干流及其支流沿岸, 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址^[7]。这些遗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

化面貌上的一致性和发展上的连续性,表明这个地区在岭南历史文化区内,可能构成了一个内部联系更为密切的考古学文化区。

这个所谓的考古学文化区——姑且名之为西江中游文化区,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分。根据目前的资料,可以分为桂北的漓江流域、桂中的柳江流域、桂南(以及越南北部)的郁江流域(包括上游的左右江、中游的邕江)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显而易见,但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许多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论述过这一问题^[8]。

与考古遗存表现出的复杂性相比,这三处支流流域在生业经济形态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上的一致性要大得多,这一点比从器物形态入手更容易讨论。根据以往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经济发展阶段,12000BP~8000BP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8000BP~6000BP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一种利用贝类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6000BP~4000BP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转向稻作农业经济为主。这一划分主要是建立在动植物考古以及工具组合的分析基础上的,年代的确定则根据碳十四测年和类型学研究。同时,环境考古学的成果为寻找这些经济类型的形成和转变原因提供了一定线索。下面针对不同区域的一些典型遗址试做讨论。

二、对典型遗址的讨论

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主要有桂林甑皮岩^[9]下层、庙岩^[10]、大岩^[11]遗址,柳州的白莲洞遗址^[12]二、三期、大龙潭鲤鱼嘴^[13]下层、蓝家村、鹿谷岭、响水等遗址,邕宁顶蛳山^[14]一期等。中期主要有桂林甑皮岩上层,柳州大龙潭鲤鱼嘴上层,象州南沙湾^[15],邕江一带如顶蛳山二、三期、

豹子头^[16]、西津^[17]、秋江^[18]、江口等大量的河旁贝丘遗址^[19],以及沿海的亚答山、马兰嘴^[20]等海滨贝丘遗址^[21]。晚期主要是隆安大龙潭^[22]为代表的大石铲遗址,以桂南为核心,分布范围极为广泛^[23],钦州独料遗址^[24]也属于这个时期。这些遗址沿干支流河岸分布在西江中游广大的地域范围内,下面我们从中选择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加以分析和讨论。

1. 桂北地区甑皮岩遗址

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自北向南均有发现,以北部漓江流域最多,皆为洞穴遗址,其中研究最为充分的是桂林甑皮岩。

甑皮岩遗址的堆积,根据2001年的发掘被分为五期,代表了从距今大约12000年到7000年间史前文化的发展及演化过程。其中第一~三期大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第四、五期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

甑皮岩的发掘者认为在生业方式上,第一~五期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基本上都是广谱渔猎采集经济。在炭化植物种子中发现有些属于可食用的种类,如山核桃、梅、山黄皮、畏芝、水翁、山葡萄以及朴树等。炭化根块茎也有一定比例。没有发现炭化稻谷或者野生稻的遗存,也没有发现稻属植硅石,说明存在稻作农业的可能性非常小^[25]。炭化根块茎的存在说明当时有可能存在芋类作物的原始栽培。但总体来说,可能由于埋藏环境的原因,可分析的植物遗存资料相当有限,无法对甑皮岩人的植物摄取结构做更全面准确的分析。动物的摄取情况则相对清楚。共出土贝类^[26]47种(主要有中国圆田螺、圆顶珠蚌、短褶矛蚌、背瘤丽蚌、蚬,其中中国圆田螺占绝大多数),螃蟹1种,鱼类1种,爬行类1种,鸟类20种,哺乳动物37种(猪、鹿、牛等),共计108种。种类非常丰富。其中哺乳动物中的猪,基本确定为野猪,推翻了过去认为甑皮岩可能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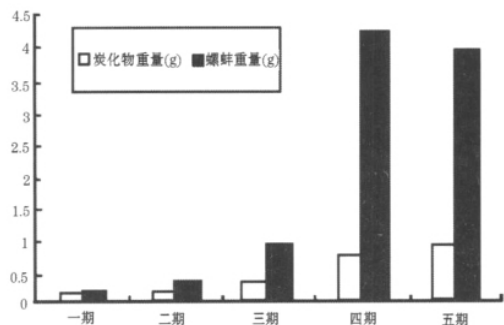
在家猪的观点。这个动物群反映出当时人完全通过狩猎野兽, 捕捞鱼类, 采集贝类来获取肉食资源。动植物遗存种类的多样性和均衡性表现出甌皮岩人采取的是一种广谱的渔猎采集经济, 这可能是符合当时生存环境的最佳觅食方式 (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 [27]。

尽管研究者并未对各期经济类型刻意做进一步的细分, 但实际上第一~三期和第四、五期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特别是对贝类的利用。

首先观察甌皮岩遗址的浮选结果,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浮选对象包含有炭化植物遗存和蚌螺碎片两类成分, 经过称重计量, 甌皮岩遗址堆积中的炭化植物含量自一期至五期呈平缓上升趋势, 但螺蚌碎片的重量在四至五期时上升的幅度非常显著。(图一)

该浮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植物和贝类在甌皮岩人食物结构中的地位和变化情况。第一至五期炭化物的缓慢上升趋势表明植物采集利用在食物总构成中变化一直不是很大, 但四至五期螺蚌重量突然增加, 则说明这两个时期强化了对贝类资源的利用, 即食物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 贝类的地位急剧上升。

这种变化在完整螺蚌个体的数量统计中表现并不充分。在数量统计中, 河蚬和中华



图一 甌皮岩遗址一至五期炭化物与螺蚌重量对比图
(引自《桂林甌皮岩》, 第289页)

圆田螺的总数在一期和二期很少, 三期时突然大幅度增加, 四期反而有所减少, 到了五期又达到一个峰值[28]。第四期螺蚌个体数量变化与螺蚌碎片重量变化的不一致令发掘者一度困惑, 难以确定这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反映了遗址堆积过程中出现的环境变化。

以上两个统计数据, 二者取信于谁, 这是一个必须加以取舍的问题。一般说来, 贝丘遗址因为年代久远, 一般情况下尽管仍然会存在大量完整的个体, 但大多数贝壳都会因为自然力的风化作用而残碎乃至粉末化, 贝壳层主要是由螺蚌的碎片组成, 总体而言, 螺蚌碎片样本的代表性要强于完整螺蚌个体的统计数据。而且, 这两套数据, 除了第四期之外, 反映出的变化趋势基本是一致的, 都体现出了遗址后期贝类利用的显著强化。所谓“甌皮岩文化”[29]的存在, 亦可能与这个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另外一个旁证可能也能够说明在甌皮岩遗址后期强化了贝类的利用, 即陶器的出现和发展。在第一期发现了一件非常原始的粗陶圈底釜, 明显处于陶器的初始阶段。甌皮岩和大岩的发掘资料表明, 桂林地区陶器的出现与大量螺壳堆积的出现基本同时或略晚, 故而发掘者推测陶器的起源可能与人类采食螺蚌类水生动物有关。

这是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 大意如下: 桂林, 甚至包括华南大部分地区, 陶器起源的动因或契机, 是由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 气候变暖, 水生动物大量繁殖, 依最佳觅食模式 (the optimal foraging model), 因其容易采集, 可以花费最少的时间和力气获得最高的回报, 人类开始大量捕捞和食用水生介壳类动物, 而介壳类水生动物因其坚硬的外壳, 不可能像鱼类和陆生动物那样可以直接在火上烤食, 促使人类发明了陶器来煮食之[30]。总之, 由于贝类必须煮熟才可以食用, 所以陶器的发明, 很可能是因应着这个经济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 而陶器的出现

又进一步推动了贝类采集经济的发展^[31]。

如果这个理论能够成立的话,因为甌皮岩始终没有发现所谓“农业”经济的现象,那么陶器与贝类利用的关系可能一直是最为密切的。陶器从一期至五期,在数量、器形、纹饰和制作工艺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以贝类利用为主的渔捞经济的发展。

除了贝类以外,脊椎动物的利用在遗址前后期也是不同的。但遗憾的是,关于甌皮岩脊椎动物的研究中,找不到较能反映物种在食物结构中地位的重量数据,难以进行利用程度的比较和判断。重量实际上最能反映人们对某一物种的利用程度。尽管不同的物种在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几率有所不同,但关于重量的统计仍然可以提供关于特定物种利用的强度和变化趋势。

关于利用种类的研究则比较充分。2001年的发掘者对动物种类在遗址前后期的变化,做了详细的观察和统计分析。发掘者对各种贝类、鱼类、哺乳动物(特别是鹿和猪^[32])所占比例做了细致的对比研究,发现了一些规律性的现象。从贝类中各期的中国圆田螺和蚬的比例多少对应,脊椎动物中各期的哺乳动物和鱼类的比例多少对应,鹿科中各期的中型鹿科和小型鹿科B的比例多少对应中都可以看出一个相同的趋势,即以第一期为最多或最少,然后逐渐减少或递增,其间主要以第三期,也包括第四期为转折点,又出现逐步增加或减少。发掘者认为,这些方面的相同可能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与当时自然环境或者人们的行为变化相关^[33]。尽管遗址中出现的动物并不一定都是食用的结果,但发掘者所针对的这几种分析对象,毫无疑问应该构成了当时肉食的主要部分,特别是鹿科动物。发掘者的观察说明不仅贝类利用在遗址前后期发生了变化,可能其他种类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之间可能具有同步关系。

由以上分析带出了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尽管发掘者根据遗存资料,反复提到甌皮岩包括桂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采取的是一种采集螺蚌为主要食物的生业形态^[34],但事实情形是否如此,仍然有商榷的余地,而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前面已经谈到,不同遗物在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几率是完全不同的,植物特别是块茎类保存下来的几率很低,脊椎动物次之,而贝类因为贝壳属于碳酸钙成分,故而保存几率极高。但事实上很多贝丘遗址,食物结构并不是以贝类为主,甚至不占主要地位。在甌皮岩这样以螺壳为主、而且螺壳堆积并不很厚的洞穴遗址中,脊椎动物,甚至植物在食物结构中的重要性可能都要比贝类大的多。一个原因在于,类似甌皮岩遗址周围的环境,并不缺少动物性和植物性资源,而这二者所能提供的热量,特别是脊椎动物的肉类,要远远高于贝类。

西方的研究曾经提到,因为贝丘遗址中贝壳数量的绝对优势比例(其中原因之一是软体动物的壳比动物骨头更容易保存),过去以此证明软体动物在这类遗址中是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来对不同物种提供的卡路里数量的研究揭示出,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脊椎动物才是人类的主食,而易于采集的软体动物只是作为补充性资源或者在非常时期的食物来源。数据显示,一只赤鹿能提供的卡路里相当于52267只牡蛎或者156800只蛤。研究发现,如果一个正常人“仅靠贝类生活”,那么他每天必须吃掉700只牡蛎或者1400只蛤才能获得足够的卡路里^[35]。以上数据对于理解甌皮岩人的食物构成,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性。

植物的情况也是如此。据吕烈丹的实验,同等重量的野生稻所能提供的热量,大约相当于螺肉的5倍;块根茎类植物提供的热量略高于螺肉,但单位时间内的采集回报率却是螺类的4倍(表一)^[36]。

植物的可食部分基本上是完全利用的。

即使脊椎动物，可以利用的程度也非常高，能够遗留下来的部分十分有限。据白莲洞的研究者观察，白莲洞出土的兽骨，95%以上的骨片长度小于5厘米^[37]。所以，它们在遗址中发现的几率和数量，有时并不能完全反映它们被利用的程度。尽管植物的种子、果实、块根茎在遗址中较难发现，鹿科等偶蹄目动物骨骼遗存的数量也远不能与螺壳堆积相比，但可能在遗址的大部分时间，这才是食物结构中的主要部分。

表一 部分动植物采集回报率的测算

	螺肉	块根茎类植物	野生稻
每小时劳动可获得量(克)	459	1800	33
每百克平均提供热量(千卡)	69	72	350
采集回报率(千卡/小时)	317	1296	116

(吕烈丹独立实验之结果。见赵志军、吕烈丹、傅宪国《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考古》2005年第11期。)

而且贝类的采集还存在一个季节性的问题^[38]。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时，甌皮岩和白莲洞这些纬度稍高的遗址，贝类是否可以全年性采集，冬夏季有何差异，也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与桂南邕江流域的河旁贝丘遗址恐怕会有所不同。桂南河旁贝丘遗址的螺壳堆积也远比桂北、桂中洞穴遗址丰厚，除了自然环境的差异之外，亦可能存在利用季节的不同^[39]。

当然，在某些情况之下——例如除了贝类之外，并没有其他重要食物来源，实际上贝类是完全可以在食物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上述遗址的晚期贝类利用高度强化，是否达到了这种程度，从遗址堆积本身尚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但从遗址螺壳堆积的厚度、出土动植物遗存以及环境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观察，似乎并不存在这种可能。从世界范围来看，如北美大西洋沿岸，那些以贝类

为主要食物形成的贝丘遗址，其贝壳层堆积的范围和厚度是极其惊人的^[40]。即使一些河旁贝丘遗址，规模也极其巨大，远非甌皮岩这类遗址可以相比^[41]。根据某些历史记载也可以知道，如果人类以贝类为主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巨大的堆积，甚至可以作为建筑材料来使用^[42]。以此判断，虽然研究者反复提到甌皮岩包括桂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采取的是一种以采集螺蚌为主要食物的生业形态，但实际上贝类几乎不可能构成甌皮岩人食物结构的主要部分。

本节所要阐明的观点只是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甌皮岩遗址对于贝类的利用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特别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距今八九千年的时候，有一个显著的提高。这种提高增强了贝类在甌皮岩人食物结构中的地位，但仍然未必能够确认它已经成为当时的主食。至于这一变化本身，是反映了自然环境中资源的变化，还是反映了人类自身行为的改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2. 桂中地区白莲洞和鲤鱼嘴遗址

柳州白莲洞和鲤鱼嘴是柳江流域早期的重要遗址，这两处遗址的情况与桂林甌皮岩类似，同处石灰岩丘陵地形，都是洞穴遗址，环境相同，而且本身相距不远，经济形态上呈现出较大的相似性，也同样在遗址晚期出现贝类利用显著强化的现象。

1) 白莲洞遗址

从白莲洞的资料来看，贝类的利用从晚更新世末次冰期后就开始了^[43]。遗址中距今15000年以后的地层螺壳堆积逐步增多，并有越晚越多的趋势^[44]。但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第五期的地层（大约距今7000年左右）已经被破坏殆尽，我们无法知道白莲洞遗址是否像甌皮岩那样在全新世中期有一个贝类利用比前期显著强化的过程。

白莲洞的贝类和鱼类化石经鉴定有：双棱田螺、乌螺、大蜗牛、道氏珠蚌、鲤鱼、

青鱼、陆龟。并且螺类化石均见人工敲击尾部,由此可见它们是人类食物资源的一部分^[45]。敲掉尾部的螺类是为了吸食方便,这种食用方法与甑皮岩遗址有很大的不同,甑皮岩的螺壳均很完整,未见敲打现象,被研究者作为煮食的一个佐证。煮食的主要工具是陶容器。白莲洞的陶器在第五期才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贝类是如何食用的?是采用其他材质的炊器煮食,还是生食或者烧食?在陶器出现以后贝类的利用出现何种变化?当前尚未发现相关考古证据。

关于贝类在食物结构中的地位,白莲洞的研究者认为,在后期地层中富集大量螺壳,而且多见人工敲击尾端,由此可以判断它们是人类日常的一种主要食物,供给人类所需的蛋白质^[46]。而且研究者认为,在第四期可能存在原始农业。因为发现了较多的禾本科花粉,而且文化层距现在地面越近,禾本科的数量越多,禾本科相对其他植物的比例也越大。尽管不能依据花粉形态确定它是野生的还是种植的禾本科农作物,但该沉积时期肯定受到人类原始农耕活动的影响和干扰,从而导致森林覆盖面积减少。总之,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是一种采集-渔猎-生产型的复合经济^[47]。

但白莲洞的情况与甑皮岩类似,在有良好的环境可以获得各种动植物食物的情况下,是否贝类构成了食物的主要部分,仍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性。

白莲洞和甑皮岩的研究者都尽力寻找“原始农业”的存在,并且发现了某些重要线索——甑皮岩遗址可能存在芋类植物的有意栽培,而白莲洞遗址可能存在对十字花科植物的种植。但除此之外,两地都没有发现有关稻作农业的任何迹象。至少这两处重要遗址的材料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漓江流域和柳江流域的洞穴居民并不从事稻作农业的生产,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早期稻作农业似乎并未对西江中游地区发生任何影响。当

然,一般来说,成熟的稻作生产并不与洞穴这种居住方式相联系。稻作农业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出现在桂北的山坡遗址,而这时无论是漓江流域还是柳江流域的洞穴遗址都已经被废弃,当地居民也开始选择了另外一种居住和谋生方式。

2) 鲤鱼嘴遗址

鲤鱼嘴遗址距离白莲洞很近,两个遗址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关系。有研究者认为,二者文化演化的轨迹一脉相承,可能鲤鱼嘴遗址就是白莲洞文化遗址的组成部分,是白莲洞遗址文化的外延^[48]。关于鲤鱼嘴遗址的分期和年代一直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认为遗址的主要内涵属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49]。1980年发掘出土陶片的年代,可能在10000年前后^[50]。

鲤鱼嘴的经济类型,从发掘资料来看,与白莲洞十分相似,从遗址的早期就呈现出渔猎采集经济的形态,直到遗址的晚期,没有发生质的改变^[51]。

根据1980年的发掘资料观察,贝类在食物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可能呈现逐渐强化利用的迹象。1980年的发掘把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并且注意到了两文化层中贝壳尺寸大小的不同。上下文化层都是大量螺壳堆积,但下文化层中螺壳个体较大,表面发黄,上文化层螺壳个体较小。下文化层已经出现夹砂陶片和1件刃部磨光的石斧,故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52]。原报告没有说明上下文化层出土螺壳的种类,看原文的表达,种类应该没有很大的改变。那么上下文化层螺壳由大到小的变化就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环境的变化,造成螺类个体小型化。第二种更大一些的可能,是存在捕捞压^[53]。如果鲤鱼嘴遗址晚期明显存在贝类的捕捞压,那么很可能说明当时存在对贝类的强化利用现象。和甑皮岩的情况相同,这里万年左右陶器的出现,也可能是煮食贝类的需要催生而成。而陶器的发展,又进一步

强化了贝类的利用。

鲤鱼嘴、白莲洞的年代比甌皮岩要早得多,贝类利用的机制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古代人类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大规模利用贝类,可能只是无奈之举,随着大型陆上动物的绝灭,人们不得不将食谱扩展到更低档的食物。但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情况可能已经有所不同。随着气温的升高,环境改善,水生动物繁盛,依照最佳觅食模式,贝类利用反而成为一种十分经济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得到高度发展。鲤鱼嘴、白莲洞的晚期和甌皮岩遗址应该都属于后一种情况。

鲤鱼嘴和甌皮岩、白莲洞遗址一样,在新石器时代中期被废弃,说明这时古代人类的居住形态发生了变化,也表明当时的社会经济方式发生了新的改变。

3. 桂南地区诸遗址

西江中游文化区在桂南的分布,实际上包括了郁江流域以及北部湾沿海一带的广大区域。桂南重要遗址很多,如邕江流域以顶蛳山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大量内河贝丘遗址(即所谓的顶蛳山文化^[54]),和北部湾沿岸的海滨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末期则是以隆安大龙潭类型为代表的大石铲文化,这已经是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文化,北部湾地带以钦州独料遗址为代表的山岗遗址也属于本时期。但贝丘遗址和大石铲文化所代表的经济类型是完全不同的。

1) 邕宁顶蛳山遗址

顶蛳山遗址是西江中游文化区极为重要的一个遗址。顶蛳山遗址的发展经历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经济类型各有不同,在整个西江中游具有十分重要的代表性意义。

根据碳十四测定年代和对出土遗物的分析比较,该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在距今1万年左右;第二、三期是遗址的主体文化堆积,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年代大约距今8000~

7000年;第四期文化面貌与第二、三期明显不同,年代距今6000年左右^[55]。

部分原因可能出于第一期的相关资料不多^[56],顶蛳山的发掘研究者关于生业方式的研究将第一、二、三期放在一起讨论,并认为都是典型的渔猎采集经济。除了食用贝类,采集块根茎类之外,还大量利用其他动植物。遗址第一至三期文化堆积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其中包括有食草类(鹿、野猪等)、啮齿类、鸟类、食肉类、鱼类、龟鳖类等各种动物。植物方面能够确定的有禾本科、棕榈科、葫芦科、番荔枝科等植物遗存,许多能够生产可食用的果实、种籽或根茎^[57]。以上这些,可能都是顶蛳山人食谱的构成部分。

但从螺类观察,实际上顶蛳山第一期和第二、三期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期地层不含或只含少数螺壳,而第二、三期(遗址第4~7层堆积)包含异常丰富的螺壳和贝壳,初步鉴定有丽蚌、田螺、钉螺、环棱螺等6种淡水螺蚌^[58]。十分显著地表明两个时期对贝类利用的不同。第一期时贝类在食物结构中可能不占重要地位,而到第二、三期时候,贝类的利用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该遗址居民在食物结构上一个重要的改变,即对贝类的强化利用。这种变化在前文对甌皮岩、白莲洞、鲤鱼嘴遗址的考察中都有发现,只是强化发生的时间和程度各个遗址略有差异。相比而言,顶蛳山遗址的变化脉络最为清晰和显著。

顶蛳山遗址从第一期开始就发现陶器的存在,二、三期陶器更加发达,但一至三期都没有发现农业的任何迹象。按照傅宪国等关于甌皮岩等桂北地区洞穴遗址陶器起源的理论推断,实际上顶蛳山陶器的发生发展可能也与对贝类的利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顶蛳山遗址距今大约9000年转化为以贝类利用为主的渔猎采集经济,在新石器时

代中期繁荣一时。到距今 6000 年迈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门槛时,经济类型又发生了一个巨变。第四期的地层中已经不含螺壳,说明这个时期已经放弃了对螺类的利用^[59]。而在关于植硅石的研究中另有重要发现,在属于顶蛳山遗址第四期的第 3 层中,禾本科植硅石的比例突然高达 99%,研究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稻属植硅石的加入。在前三期文化中没有发现任何稻属植硅石,而第 3 层突然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稻属植硅石,而且从形态上判断,顶蛳山遗址出土的稻属植硅石基本上都属于栽培稻,说明在顶蛳山第四期采取的是一种与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即稻作农业,并且达到了相当的规模^[60]。

第四期的年代大约是在距今 6000 年前后,即将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顶蛳山的水稻遗存是西江流域发现的最早的稻作农业,开启了西江流域后来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时代的先河。

顶蛳山稻属植硅石出现的突然性表明,顶蛳山第四期的稻谷不是在当地栽培而成的,而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61]。而且有可能在传入的时候,水稻种植技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一经落地即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比顶蛳山遗址年代更早而且成熟的稻作农业遗迹只存在于长江流域。西江中游的水稻从长江中游传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顶蛳山遗址的稻作研究有一定的超前性,目前漓江流域和柳江流域还没有发现同时期稻作遗存的任何迹象。但在桂北属于长江流域的资源晓锦遗址,却发现了丰富的稻作遗存^[62]。资源晓锦的第一期,没有发现稻属作物的迹象,而在第二期(大约距今 6500—6000 年),突然出现了大量的炭化稻谷,明显存在稻作农业。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洞庭湖地区传入的^[63]。这个年代比顶蛳山第四期略早,顶蛳山的稻作农业是否与晓锦遗址同源,或者就是由桂北一带的

晓锦类型遗址传播而来,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证据。

目前,稻作农业最早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线索已经比较明确,而华南和西南地区稻作农业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而来也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岭南——福建和西南地区出现的时间却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关于广西稻作农业出现的时间,有学者认为,实际上顶蛳山第四期和晓锦第二期的年代都没有公布的那么早,可能都已经接近新石器时代末期,大约 4500 年^[64]。作者的推断主要从器物类型学出发,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个估计可能偏晚。因为所谓大石铲文化是公认的较发达的农业文化,虽然并没有发现稻作遗存的直接证据。而大石铲遗址的最早年代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

2) 隆安大龙潭类型与钦州独料遗址

顶蛳山遗址第四期之后,真正开启了西江流域发达稻作农业文化的是所谓的大石铲文化。虽然没有植物考古方面的证据,但所谓的桂南大石铲文化已经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农业文化,这一点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很大争议。而且有学者认为,大石铲文化是后来高度成熟的稻作文化——壮族“那文化”的先河与基底^[65]。

桂南以大石铲为特征的文化遗存,以隆安县乔建镇大龙潭遗址^[66]为代表,有学者称这类遗存为大龙潭类型^[67]。大石铲遗存的核心地带在桂南的隆安、扶绥、崇左、南宁、武鸣一带,尤其是左江和右江汇合而成邕江的三角地带,遗址分布特别密集。影响所及更是极其广泛,广西大部、广东西部、海南和越南北部都有发现,整个广大范围之内,可能都是这种农业文化的影响和分布区。

大龙潭遗址的年代,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83 年公布的碳十四数据,为距今 5300 年左右,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68]。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年代与顶蛳

山遗址第四期的年代相距不远。而整个大石铲文化的延续时间很长,下限有可能已经进入到了铜石并用时代^[69]。

大龙潭类型不仅仅与顶蛳山遗址在年代上相接,更重要的是可能确实有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顶蛳山遗址贝丘(一至三期)与非贝丘(第四期)堆积两个阶段都有表现。有学者称,大龙潭类型双肩石铲的始祖,是桂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贝丘遗址中就已经出现的双肩石器(石斧),说明这两类文化的某些因素有一定的继承关系^[70]。钦州独料遗址也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石铲农业文化的分布区,发现有少量大龙潭类型的石铲,出土双肩石器,陶器、石刀和石锛与顶蛳山第四期有一定相似之处^[71]。发达的大石铲农业文化是顶蛳山第四期稻作农业的继承者是有一定可能的。

三、结 语

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但在经济类型和发展阶段上却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底层原因实际上在于所在地理单元和自然环境的基本相同,这足以促使这片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漫长的发展岁月中逐步形成一个文化上有密切联系的区域单位,本文姑且名之为西江中游文化区。

西江中游文化区生业经济的类型、特点和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做如下总结:

1.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广谱渔猎采集经济。以桂北漓江流域、桂中柳江流域的洞穴遗址,以及邕江流域顶蛳山第一期为代表。狩猎和植物采集(包括根块茎的利用)在食物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贝类的利用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开始,没有发现动物驯养,原始农业的迹象也不明显。所谓“甌皮岩文化”属于这个时期的晚段,并延续到下一个时期。

2.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贝类利用为主的

狩猎采集经济。以邕江流域的贝丘遗址,即顶蛳山文化为代表,但实际上贝类强化利用的现象在桂北、桂中洞穴遗址的晚期已经开始明显出现。贝类等水生动物的利用在人类食谱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可能并非主食。狩猎和采集也是重要的食物来源。没有发现动物驯养和稻作农业的迹象。

3. 新石器时代晚期较发达的稻作农业经济。稻作农业可能是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从长江中游地区突然传入的,在资源晓锦和顶蛳山遗址都发现了这个阶段的考古资料。稻作农业在引入西江中游地区之后,有了迅猛的发展,高度发达的大石铲文化影响到几乎整个广西、广东西部、海南和越南北部地区,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

- [1] 赵志军. 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45.
- [2] 苏秉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85 ~ 92.
- [3] 卜工. 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211 ~ 212.
- [4] 张弛, 洪晓纯. 中国华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采集渔猎文化.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 考古学研究(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415 ~ 434.
- [5] 这些平地自北向南包括漓江平原、柳州平原、来宾平原、迁江宾阳平原、浔江平原、郁江平原、横县平原、武鸣盆地、南宁盆地、坛洛平原、苏圩平原、钦州平原、玉林盆地、博白平原、合浦平原等。
- [6] 不包括左右江、柳江等河流的干支流深入桂西、桂北山地的部分。
- [7] 广西目前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约 400 处, 发掘 40 余处(见李珍《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七十年述略》,《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 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36 页)。这 400 余处遗址, 2/3 以上集中在西江中游。发掘过的重要遗址, 也以此处为多, 并且资料大都已经发表。
- [8] 这方面的研究如: a. 焦天龙. 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

- 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 考古学报, 1994, (1).
- b. 李珍. 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七十年述略. 广西考古文集 (第二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c. 梁旭达. 广西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初探.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 d. 彭长林等. 试论广西新石器时代文化. 广西考古文集 (第三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e. 林强. 广西史前贝丘遗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探讨. 广西考古文集 (第三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 桂林甑皮岩.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10] 湛世龙. 桂林庙岩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11] 傅宪国, 贺战武, 熊昭明, 王浩天. 桂林地区史前文化面貌轮廓初现. 中国文物报, 2001-04-04 (1).
- [12] 广西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编著, 蒋远金主编. 柳州白莲洞.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13] 鲤鱼嘴遗址经过了 1980、1987、2003 年三次发掘, 分别发表的主要资料有: a. 柳州市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考古, 1983, (9).
- b. 李珍等. 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探讨. 中石器文化及有关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 c. 傅宪国等. 柳州鲤鱼嘴遗址再度发掘. 中国文物报, 2004-08-04.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98, (11).
-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象州南沙湾贝丘遗址 1999-2000 年度发掘简报. 广西考古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 广西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发掘. 考古, 2000, (1).
- [17] 彭书琳, 蒋廷瑜. 西津贝丘遗址及其有肩石器. 广西文物, 1992, (3-4).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 广西横县秋江贝丘遗址的发掘. 广西考古文集 (第二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 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考古, 1975, (5).
- [20] 广东省博物馆. 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考古, 1962, (12).
- [21] 北部湾沿岸实际上属于桂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范围.
- [2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2, (1).
- [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 广西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 文物, 1978, (9).
- [24]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 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82, (1).
- [25] 同 [9]: 293.
- [26] 广西河旁贝丘遗址堆积以螺壳为主, 与海滨贝丘以贝壳为主的堆积有显著不同, 但在生物分类学上, 二者都属于贝类.
- [27] 同 [9]: 344~346.
- [28] 同 [9]: 289.
- [29] 同 [9]: 450~451.
- [30] 同 [9]: 452.
- [31] 同 [9]: 457~458.
- [32] 鹿科动物在甑皮岩人动物食谱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在 1973 年和 2001 年的动物出土标本中基本上都占半数以上, 尤其是可鉴定标本, 在各期都占据 80% 以上. 而数量上居第二位的猪的比例则始终很低, 最多没有超过 7%. 其他动物的数量更少.
- [33] 同 [9]: 335.
- [34] 同 [9]: 452.
- [35] 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译.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303.
- [36] 赵志军, 吕烈丹, 傅宪国.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 2005, (11).
- [37] 同 [12]: 132.
- [38] 贝类利用的季节性在国际考古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 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参见: 史本恒. 国外考古学界的贝类研究. 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 东方考古 (第 5 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39] 如果做更深入的讨论, 虽然二者长期同被视为贝丘遗址, 实际上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存在一些极其重大的差异的.
- [40] 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贝丘遗址范围往往达数千英亩, 高度达数十英尺. 参见: W. H. Holmes, Aboriginal Shell-Heaps of the Middle Atlantic Tidewater Reg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9, No. 1 (Jan. - Mar., 1907), pp. 113-128.
- [41] 如美国缅因州的 Whaleback 河旁贝丘遗址, 以牡蛎

- 堆积为主, 未被破坏之前, 长度超过 1650 英尺, 宽度为 1320 ~ 1650 英尺, 贝壳层厚度达 30 英尺。时代是从 200B. C. 到 1000A. D., 延续了大约 1200 年。
- [42] (唐) 刘恂《岭表异录》记载 “卢亭者, 卢循背据广州, 既败, 余党奔入海岛野居, 惟食蚝蛎, 垒壳墙壁。”
- [43] 这可能是冰后期全世界的共同现象, 特别是所谓的中石器时代。
- [44] 同 [12]: 137.
- [45] 蒋远金, 李刚. 浅析白莲洞遗址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中期古气候古环境的演变及其对古文化演化的影响. 环境考古研究 (第四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14.
- [46] 同 [12]: 132.
- [47] 同 [12]: 137.
- [48] 同 [12]: 182.
- [49] 同 [12]: 180 ~ 181.
- [50] 原思训. 华南早期新石器¹⁴C 年代数据引起的困惑与真实年代. 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 转引自: 柳州白莲洞: 367.
- [51] 刘文, 张镇洪. 广西大龙潭鲤鱼嘴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动物群的研究. 环境考古研究 (第四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43.
- [52] 柳州市博物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考古, 1983, (9): 77.
- [53] 由于当时人长时间地捕捞某种特定的贝类食用, 迫使贝类持续地非正常死亡, 从而影响到这些贝类的自然生长规律, 这种由于人的行为所形成的致使贝类尺寸变小的原因称为捕捞压。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247.
-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98, (11): 32.
- [55]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98, (11) .
b. 赵志军, 吕烈丹, 傅宪国.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 2005, (11) .
- [56] 第一期仅仅发现于 T2206 和 T2207 两个探方的第④层。
- [57] 赵志军, 吕烈丹, 傅宪国.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 2005, (11) .
-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98, (11): 12.
- [59] 而且第二、三期高度发达的蚌器第四期也已基本不见, 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 [60] 赵志军, 吕烈丹, 傅宪国.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 2005, (11): 81.
- [61] 赵志军, 吕烈丹, 傅宪国. 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出土植硅石的分析与研究. 考古, 2005, (11): 82.
- [62]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资源县文物管理所. 资源县晓锦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广西考古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101 ~ 153.
- [63] 赵志军. 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再认识.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148 ~ 149.
- [64] 张弛, 洪晓纯. 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南方文物, 2009, (3): 65.
- [65] 覃义生, 覃彩銮. 大石铲遗存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的探讨. 广西民族研究. 2001, (4) .
- [6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82, (1): 9 ~ 17.
- [67] 陈远璋. 桂南大龙潭类型遗址初论.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09 ~ 420.
- [6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¹⁴C 年代数据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转引自陈远璋. 桂南大龙潭类型遗址初论.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12.
- [69] 陈远璋. 桂南大龙潭类型遗址初论. 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413.
- [70] 同 [69]: 419.
- [71]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钦州县文化馆. 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82, (1): 1 ~ 8.

(责任编辑: 方燕明)